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逻辑之建构

陈宇翔 谭彩霞

[摘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政治决议,也是对我们党和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事业产生重要影响的纲领性文献。决议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为基本思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线索,对党的历史进行“系统性”总结和“批判性”审思。决议是我们党站在理论反思的高度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核心命题的自觉回应,呈现出用“中国经验”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在逻辑,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搭建了重要的话语平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的境界。探析和阐发这一逻辑,不但有助于我们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对新时代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陈宇翔,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谭彩霞,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1]正因为如此,历史所凝结的实践经验成为话语建构的重要资源乃至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文化的深层意义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或话语体系)的丰富与发展,即建构面向“中国问题”、更有针对性、更具指导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建构始终是积累经验并激发创新活力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对历史经验的客观思辨和理性反思。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都建立在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1945年4月20日经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政治决议,也是对我们党和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事业产生重要影响的纲领性文件。《决议》以总结历史经验的严谨方式统一了全党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科学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核心命题，初步勾勒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轮廓，为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搭建了重要的话语平台，从根本方向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一立意呈现了用“中国经验”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在逻辑。

一、审视“前车之覆”，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必要及可能

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首先要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必要、如何可能？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基础问题，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成立与否。《决议》从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中，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理性审视“前车之覆”，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缘由和现实意义，使全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明确认知和一致立场。

众所周知，中国先进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在遍寻救国方案而不得后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承载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方向指引，探寻“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并形成了“主义”与“实境”相结合的初步认识。彼时的党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对中国国情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加上实践经验尚未积累到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规律的程度，党内并未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明确认知和一致立场。冯契在反思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时指出：“人类的历史只有发生到一定的阶段才能进行自我批判，在此之前，人类对自己的国情往往只有片面的理解。”^{[2](P19)}这说明，实践的充分发展是形成科学认知的重要前提。历史所凝结的实践经验，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实现认识飞跃提供丰富资源和重要支撑。实际上，以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的历史经验为依据，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来看，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无疑对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缘由和现实意义，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及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决议》起草之时，我们党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艰苦奋斗。在这一过程中，既有成功经验，如北伐的胜利、土地革命的发展；也有失败教训，如大革命的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决议》正是在借助历史所提供的这一丰富资源的基础上，从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特点和科学把握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角度，对党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通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鲜明对比，使大多数人深刻认识到：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无论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后退，归根结底，在于是否“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发展的历史缘由和

内在合理性，说明这一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原则，也契合“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3](P22)}同时还是我们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错误常常是正确行动的先导。恩格斯说：“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4](P560)}因此，《决议》在审视历史时，有意将重点放在对失败教训的反思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更加凸显。历史地看，我们党为实现革命胜利的奋斗历程中，党内连续出现的“一右三‘左’”的错误，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使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一度陷入绝境。这些沉痛的血的教训，更具穿透人心的力量，更能起到当头棒喝的警示作用，使继之而起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错误中觉醒过来。《决议》在总结和反思这些“前车之覆”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时代的呼唤中和历史的选择中形成、发展并走向深入的历史逻辑，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说明：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和人民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党的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并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澄清“路线是非”，明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要旨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精当把握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及实践展开。《决议》以这一科学认知为前提，围绕“路线是非”揭示出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旨予以明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中走向深入的发展过程。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时，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思考并在实践中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因而也就在客观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正如《决议》开篇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3](P3)}但自踏上革命征途起，党内也围绕着中国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存在着矛盾和分歧，并通过党的路线，尤其是党的领导路线反映出来。党的路线，主要指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或一定历史阶段为实现其目标任务而制定的总方针、总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形态转化为实践形态的中介。中国共产党探索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路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将马克思主义自觉应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毛泽东说，“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5](P605)}并把党的路线比作“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6](P316)}邓小平毫不讳言地指出：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7](P205)}因此，《决议》在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时，把澄清“路线

是非”摆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并从逻辑上导向了如下主张:基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对党成立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这一时期容易引起思想分歧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明确的结论,在澄清“路线是非”、建立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旨予以阐明。

第一,《决议》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教条式捍卫,科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实践指向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的具体化。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决议》全面、系统地回顾了“两条路线”发展及斗争的历史,对党自成立以来发生的“左”、右倾偏向作出客观的评价和分析,并将锋芒直指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是对党的历史的完全歪曲。《决议》毫不含糊地划清“两条路线”的区别和界限,并在澄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错误之所在,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实质”,忽略了“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3](P22-23)}由此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过程。

第二,《决议》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进行拨乱反正,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旨在于坚持和发展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8](P374)}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解决的是在中国如何运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决议》辩证地把对“正确路线”的肯定同对“错误路线”的批判结合起来,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揭示出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指出:正确路线之所以正确,关键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创造地应用于中国实际,“光辉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要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做到“一个分清”,即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由此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内容远比反对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等偏向深刻、丰富,其要旨在于解决党的指导思想的问题,使全党在实际运用中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三、剖析“错误之源”,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化”,即如何实现的问题。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旨予以明晰后,需要进一步为之扫清思想障碍,树立正确的立场、方法,寻求有效的实现路径。为此,《决议》进一步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剖析“错误之源”,第一次从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

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普遍遵循的原则和主要致力的方向。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党之所以一再犯“左”、右倾错误，关键在于没有从思想上对这些错误作全面、彻底的清算。延安整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整顿“三风”（学风、党风和文风），肃清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特征的“左”、右倾错误，尤其是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普遍整风后，就整体倾向而言，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已成为党内共识，但大多数党员干部对其错误及危害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表面上，很难从社会、历史、阶级及思想等方面全面地分析和清算它。这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只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深挖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源，才能避免重犯类似过去的错误。思想路线，主要指人们（或政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思想路线不同，认识和对事物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民主革命时期，以“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为表征的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实质上就是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这两种思想路线的对立。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要求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现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它是我们党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法，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习近平也多次强调：实事求是“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9]“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10]主观主义，则与之完全相反，以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毛泽东指出：“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11](P819)}两条思想路线的都以同一个“主义”为理论基础，所涉及的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的历史回应。由此看来，思想路线的分歧也就相应具有历史选择的意味。事实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在同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因此，通过审视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来剖析“左”、右倾偏向的“错误之源”，以达到彻底肃清之目的，就成为《决议》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应有之义。

其一，《决议》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为方针，分析“左”、右倾错误的内容、表现及根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一种直线式的上升运动，而是受到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制约性因素的阻碍。只有认清它们的表现形式及其产生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破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痼疾。《决议》从“两条路线”发展及斗争的历史中概括出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及特点：一种是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生搬硬套、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苏联经验模式化的教条主义；一种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把主观经验当信条，满足于一德之功、一孔之见，轻视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决议》着重批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概括其主要内容

的基础上深入剖析“错误之源”，指出：一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3](P22)}

其二，《决议》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服“左”、右倾偏向，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学风问题是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和“态度问题”。“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11](P812)}在党的建设中起着不容忽视的基础性作用，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重要的问题”。^{[11](P813)}总体上看，《决议》所述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宗派主义，就实质而言，就是以主观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正派”的学风、党风问题。《决议》不仅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揭示出两条思想路线的实质，即主观主义的学风和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对立，并且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方针，采取整风的形式、学习和教育的方法来加强学风、党风建设。具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对教条主义而言，就是要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使全体党员干部既能掌握马克思主义之“矢”，亦能认准中国实践之“的”；就经验主义而言，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借助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化理论教育；于宗派主义而言，就是要发扬党内民主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决议》在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时刻，提出一个对党及中国革命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意义的学风、党风问题，从根本上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党的问题。历史表明，良好的党风和学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认知机制上确立实事求是的价值标准，掌握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根本的思想原则和思想方法。

四、立足“中国实践”，创建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

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核心，就是要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这一目标是否实现，主要看是否拥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决议》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着眼于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结合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11](P820)}初步建构起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体框架。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为基本范畴的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12](P311)}有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难以企及的鲜明的实践性：它不仅要从理论上“解释世界”，更以“改变世界”

为己任。这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走进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之间展开的辩证运动，其根本目的在于解决中国社会发 展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历史间距，因此，在应用时必须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进行必要的选择性运用，并结合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进行必要的创造性整合，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运动中实现丰富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力求趋向思想。”^{[13](P12-13)}如此，才能充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效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历史表明，离开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教条式地引用马克思主义，不仅给党及其领导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而且最终也会影响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决议》以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方式审视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实践要求，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初步建构起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在理论实践化和实践理论化的双向互动中推进理论创新。

一方面，从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是话语建构的重要前提。“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13](P287)}任何哲学范畴，都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4](P526)}这实际上揭示了所有精神创造或理论创新都来源于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来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15](P134)}因此，在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过程中，对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性反思就显得尤为重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历史经验教训对革命事业的镜鉴作用，并从指导革命事业的高度凝练和提升历史经验的内在价值。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5](P533)}《决议》辩证地把正面的理论阐发同反面的理论批判结合起来，通过“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相对照的形式，全面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实践为取向，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条件”，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和实践需要的原则、方针和政策，初步勾勒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轮廓，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必然性和实践规律性的角度阐释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必然逻辑，说明它是马克思主义合乎逻辑的理论延伸。

另一方面，实践是检验理论客观真理性的权威依据和公正裁判。真理要成为真理“必定要经历一个辩证的过程”。^{[13](P283)}这一过程不仅包含理论本身在实践中丰富发展的问 题，也包含人们的认识在实践中提升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理论的问题都是实践的问题。实践不仅是催生理论、提升理论的源头活水，更是检视理论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标准。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

思维的真理性。”^{[13](P500)}毛泽东直言:“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11](P817)}由于未来尚不可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展开的历史就成为人们探寻客观真理世界的最佳选择。党的历史所凝结的实践经验自然也就成为检验证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的重要资源和有力支撑。正因为如此,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党所经历的“具体的”历史实践为依据,检验证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及其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同时也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决议》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重要方法和路径。

五、聚焦“思想领导”,形成全党认同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共识

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实质,是要锻造“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有的思想基础,并转化为创造历史的“实践力量”。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话语体系的承载与推进。《决议》以借助政治决议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澄清思想混乱、统一思想认识,开创了党的建设的新形式,使全党形成认同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共识。

科学理论的价值彰显及能动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掌握群众。因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3](P320)}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3](P11)}正是从这一理论原则出发,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6](P77)}“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5](P435)}并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和指导党,作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首要任务。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历史范畴。因此,坚持党的思想领导,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更突出地体现在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武装党,正所谓“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17](P15)}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通过理论阐述,讲清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确性;另一方面搭建话语平台,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党员干部及广大群众所接纳、所信仰、所掌握,真正成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体意识和思想观念。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奋斗中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理论。延安时期,这一思想得到多面展开并走向成熟,但直至延安整风前,党内对其是否能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仍存在争论和分歧。因此,亟需搭建一个有效的话语平台,努力把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为新的实践提供与时俱进的理论武器。

党的重要会议及其形成的决议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具有独特

的政治功能和政治效应。依托党的重要会议，不仅可以通过讲话发言、深入交流、广泛讨论等形式深化认识、加深理解，也可以借助其形成的决议对容易引发思想分歧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认同性整合，以达到思想统一、政治同心和行动同步。价值共识是实现认同性整合的基础和前提。价值共识的达成，带来的不仅是持续的支持，而且还有动员和执行的高效。价值认同的实现有赖于两大途径：一是寻求科学的价值导向；二是依赖权力的推动（包括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国面临“两个前途”选择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要使全党达到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动员一切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大风暴，仅通过科学的价值导向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党的会议及其形成的决议来推动价值目标的实现，就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决议是反映党的领导机关意志、具有指导意义的决策性文件。决议一经公布，全党上下都必须坚决执行。据笔者查阅，作为公文文种的“决议”，最早见于中共一大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8](P6)}此后，“决议”逐渐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频繁使用。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更是将党员绝对服从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议决加以明申。^{[18](P167)}党章是一个政党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是“最根本的党纪党法。”^{[7](P147)}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来说，党性规定要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这一党性原则催生了一种组织氛围，使人们更加容易接受党的倡导和决定。将“服从决议”写入党章在一定程度上使服从和执行决议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备的素质。^{[19](P72-78)}因此，利用“决议”来统一全党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形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和指导党的明确认知，在当时条件下不仅具有历史合理性，也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决议》由起草开始，通过集体参与、广泛讨论、反复修改，再到最后经党的会议表决通过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认同性整合的过程。就《决议》本身而言，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结晶，以解决思想分歧，实现全党在毛泽东思想上的团结为主要任务。因而，在内容上，它不仅对“左”、右倾错误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而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所开拓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并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典范加以确认，明确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和武装党。就实践结果看，它肃清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大团结，为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继续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总的来看，《决议》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0](P1)}为基本思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线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建立在“中国”这一不可动摇的“基地”之上，并贯穿了这样一种逻辑：“事实胜于雄辩”，从而使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更具科学真理性。在这一文本的影响下，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21](P334)}的旗帜在全党树立起来，进一步引领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

其二元对立的思维取向和“个人”与“集体”混为一体的话语表达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理论罅漏,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失误的重要因素。^[22]尽管如此,《决议》的起草出台仍体现着一种深邃的理论思维的觉醒,表明我们党对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过程中所涉及的实践与理论问题达到一种认识上的升华。这一升华超越了一般性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而是借“历史话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在全党加以明确,为实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质的飞跃搭建了重要“桥梁”,从根本方向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它的成功不仅为36年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话语提供重要参鉴,对于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话语”的继续建构和诠释,同样深具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 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N]. 人民日报, 2013-01-02(1).
- [2] 冯契.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 上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3] 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的回顾[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6] 毛泽东文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7]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8] 毛泽东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9] 习近平.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8-21(2).
- [10] 习近平. 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06-13(2).
- [11]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2] 列宁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5] 列宁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6]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7] 胡锦涛. 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18]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19] 陈云文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2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21] 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2] 陈宇翔，谭彩霞.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塑立的逻辑理路：基于两个《历史决议》的分析[J]. 湖湘论坛，2016，（4）.

Resolution to some Historical Issues of the CPC and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Marxist Discourse in China

Chen Yuxiang Tan Caixia

Abstract: *Resolution to some Historical Issues of the CPC* is the first political decisi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CPC . It is also a programmatic document for the party and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It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systematically the history and experience of the CPC with the “history is the best textbook” as the basic idea, with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s the basic clue. It provided a new scientific answer to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 what’ s Marxism, how to insist and develop on Marxism? ” demonstrating the inherent logic of Construct a new form of Marxist——Mao Zedong thoughts, which based on Chinese experience, and then realize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Marxism to achieve a new stat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tudy the issue posses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curate master of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Marxist and advance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Key words: Resolution to some Historical Issues of the CPC, Mao Zedong thought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责任编辑：蒋旭东]